

学林

← (上接9版)

生仍须选择其他系科作为“主专业”。项目的要求也简单明了：在完成原有常规系科的课程之外，学生必须选修有关东南亚知识的研讨课以及东南亚语言课；而他所撰写的论文主题，也必须和东南亚区域主题相关。

很多人都会认为卡欣的举措过于保守、妥协。但是如果对比其他某些研究中心的状况，我们就能认识到卡欣方式的务实和合理。与康奈尔同时设立东南亚研究中心的还有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起初建成独立的院系，坚持单独培养学生，颁发自己的学位证书，结果遭到了很多院系的抵制和反对，发展艰难，一度萎缩 (Andrey Kahin, 'Growth and Crisis: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s First Two Decade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Fall Bulletin 2007, pp8)。卡欣的妥协只是暂时的，进入1960年代，随着东南亚项目的壮大、成熟，项目也从“远东研究学系”中分离出来，取得了更独立的地位。

“跨学科协作”是地区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地区研究当然具有很强的“政策相关性”，但是它远非仅仅面向“现实”和服务于政策的学问。它强调对于地区状况的深度学术和文化理解。卡欣虽然主要研究政治学，但是他并不夸大政治学的地位和作用。他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看做相互关联的方面，强调无论是研究政治还是经济，都不能脱离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性。比如，想要研究印尼的伊斯兰政党，就不仅要了解政党的组织架构，还要涉及印尼的宗教、穆斯林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等多个方面。在卡欣看来，地区研究要综合调动和运用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甚至地理学、农学等多种学科资源。二战时，美国的情报机构对此种组织形式已经有所尝试。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征召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从事某一区域或国家的研究，跨越了学科界限。但是这种学术组织形式在大学中还完全是一个新鲜事物，没有多少经验可循。

卡欣将东南亚项目打造成了“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东南亚项目创立的宗旨之一就是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增进学生对于某一特定地区的了解，进而培养优秀的地区研究者”。项目中教师来自各个院系，负责讲授东南亚的政治、经济、文学、法律等领

域的知识。项目对学生的院系背景没有限制，鼓励来自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学生加入。在研讨中，除了2位教师主持人外，项目还会邀请客座教师讲授特定主题，兼及国家历史、政治、社会、宗教、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学生被给予了较大的自主性，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挑选3位老师组成“专门委员会”。在完成少量的必修课程之外，他们可以根据委员会的建议，自由选择项目的课程、确定论文选题。论文经委员会3位成员的审核，即可通过。这样，每个学生的兴趣和专长都可以得到充分施展。

跨学科的组织形式，不仅有助于构建关于海外世界的知识体系，而且也会影响传统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美国的社会科学长期以来都是以西方世界的经验和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经常不言自明地认为依据西方的经验就可以总结出通则性、普世性的理论。在对非西方世界的调查研究中，很多学者发现所谓“普世性”的理论对某些特定地区并不适用。地区研究的成果不仅修正、补充了旧有理论，而且还催生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认识视角。随着地区研究运动的推进和深入，“文化相对性”的理念被加以申述阐扬。

文化相对主义主张“对外国地区建立充分认知，以至于达成这样一种自觉，即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我延续的和独特的形构，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其独特的历史当中开发出解决其生活问题的办法；没有一种文化能够绝对地或者天然地优越于其他文化”(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26页)。通过对域外地区、异质文明的了解，地区研究学者经常发现每种文化都有着对当地人和社会的独特意义与存在价值，所以更倾向于认为不同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反对等级制的文化观念。在地区研究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引领下，一些美国人开始重新理解“他者”，并进而重审自身文化。我们虽然不应过于夸大地区研究的影响，但是地区研究对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的确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是，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以及平权运动，乃与地区研究大有关系。

跨学科是地区研究的优势，但是跨学科经常是复杂和微妙的，要面临各种制度和观念上的不适和障碍。很多学校

的地区研究中心因为师生分散在各个院系、组织架构过于松散而缺乏认同感。为了加强项目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凝聚力，卡欣向校长申请了一栋废弃的房子作为“现代印尼计划”(Modern Indonesia Project)的办公场所，亲自带领学生修缮、装修房屋。项目的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可以自由申请办公室。“西街102号”(102 West Avenue)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为学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著名的“棕色袋子午餐会”就于此举行，学生和老师在用餐时交流讨论，其乐融融。师生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以致于东南亚项目得来“康奈尔黑帮”(Cornell Mafia)的戏称。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师长的呵护下，从众人口中的“安德森宝宝”逐渐成长为一代学术领袖。如若没有这幢房子，东南亚项目的老师和学生可能就会分散在校园各处，缺乏交流与思想的碰撞，流于分散。专属的活动场所，也间接加强了东南亚项目的独立地位。

在美国地区研究特别是东南亚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现代社会科学常见的“碎片化”倾向。东南亚是中国、印度、西方文化交汇、碰撞之地，在东南亚国家之间、半岛和群岛之间、古代和近现代之间的差异性极大。就连“东南亚”这一区域概念本身，也不断受到质疑。在东南亚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学者过于专注国别研究，而忽略东南亚整体的联系。他们的视野也因此过于狭隘，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发展。

卡欣特别强调整体性视野和比较研究。他要求学生在选修国别史课程外，还必须选修具有比较特性和“泛东南亚”的课程，比如“非殖民化的比较”、“东南亚的山地部落”、“东南亚的农村发展”等(Benedict Anderson, *A Life beyond the Boundaries: A Memoir*, London: Verso, 2016, pp36)，着重培养学生对东南亚的整体意识和比较研究的自觉性。为此，卡欣寻求对东南亚的“全方位覆盖”，尽力达成每一国家地区、各个历史时代的教学和研究均衡布局、全面发展。比如，到了19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进行，卡欣发觉无论是康奈尔还是美国，对于印度支那地区的研究都过于薄弱。在美国国内学者匮乏的情况下，卡欣竭力从海外延聘老师和访问学者，甚至利用很多特殊渠道，邀请诸如英国前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南越的“国防部长”陈文敦到康奈尔讲学。



卡欣(左二)与北越总理范文同(右一)，河内，1971年8月13日



卡欣在河内机场，1972年9月23日



卡欣向康奈尔大学校长申请了一栋废弃的房子“西街102号”作为“现代印尼计划”的办公场所

卡欣的教学、研究理念，使得东南亚项目培养出大批诸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这样的优秀学者。在整体视野和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学者更容易超越相对简单的经验研究积累，得到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认识。安德森日后回忆，《想象的共同体》的完成，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卡欣的培养。

在学术研究之外，卡欣对学生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卡欣认为学者应该肩负“启蒙公众”的职责。卡欣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激烈的言辞也不意味着对国家和政治

放弃希望。相反，他不排斥与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悉心培养其中的年轻官员，将对明智的政府的期望寄予他们身上。他将这份道德关怀和积极介入政治的态度传递给了学生。有很多外国学生，特别是东南亚的留学生，毕业后回到祖国，成为重要的学术、政治领袖。

在卡欣的领导下，康奈尔东南亚项目成为地区研究的重镇，“康奈尔模式”也被学生带到了全世界的大学中。赫伯特·费思(Herbert Feith)在澳大